

绪 论

黄河落日，大漠孤烟，炎黄足迹从西安流传；
丝绸之路，古城楼兰，华夏的风度从西安伸展；
秦月汉关，唐风宋韵，中华的文明从西安显现；
“西安事变”，圣地延安，现代中国的巨轮从西安
飞转。

—— 自序

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有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最早的教育场所，中国原始文字的子遗，是在西安产生；中国最早的教育制度，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在西安出现；中国早期的国子监，中国完善的科举制度，也是在西安问世；中国最早的地方学校，中国历史悠长的书院，也与西安的发展紧紧相连……

同时，一个毋庸置疑的现实是，这些教育的历史传统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制约着我们当今的教育，为我们开创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教育大业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渊源。因此，整理、研究西安教育及其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西安教育的内涵与范围

一、西安教育的内涵

西安教育有其特定的涵义，它不局限于今天西安市的教育。理由很简单，西安教育犹如一条源远流长、浩瀚深邃的江河，流经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如原始时期的“半坡教育”、西周时期的“丰镐教育”、秦汉的“汉城教育”、隋唐的“长安教育”，直到明清及以后的“西安教育”等等。然而，总起来讲，还是称为“西安教育”较为准确。这好比中国文化，笼统的叫法还是称“中国文化”或“中华文化”为好，不要叫“华夏文化”“炎黄文化”，更不能叫“大唐文化”“大清文化”以至“大汉文化”这些都不准确。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对中国传统教育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莫过于封建的传统教育，其源头可追溯到周公、孔子的教育思想，尔后得到了历代教育家的改造和发展，大致完善于南宋的朱熹，标志是程朱理学教育思想的确立。在西安，则是以张载关学思想的形成为标志。随后，这一教育思想和实践即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正统教育。这种上起中国奴隶社会末期，下迄封建社会结束，以儒家教育思想为主体而形成和发展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遗产，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西安传统教育。这一教育，是西安先民在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世代形成、积淀，为大多数人所认同而流传下来的古代教育，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的西安教育。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卷进世界资本主义的潮流，西安固有的传统教育在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动中，在西方文化的碰

撞、冲击下，发生了解体和蜕变，也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一样，产生了与传统教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带有过渡性质的西安近代教育。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中国政治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西安教育也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因此，本书也包括了对清末、民国时期西安近代教育内容的阐述。

由此可以看出，西安教育，尤其是西安传统教育，只是整个西安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泛指西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的教育。由于近代教育带有过渡性质，如果把西安传统教育的下限放宽，也可以延至新中国成立前。西安教育是西安文化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不但占据了西安文明社会的绝大部分时期，而且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仍然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 做到古为今用”。

二、西安教育的范围

根据以上我们对于“西安教育”内涵的理解，谈西安教育，特别是西安传统教育，不能只用西安今天的行政区划去限定研究、讨论的范围。西安教育其实根本不能脱离陕西教育、特别是关中地区的教育，甚至可以说，不能脱离整个中国的传统教育。原因很清楚，西安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例如周、秦、汉、隋、唐等 13 个王朝与政权曾在此建都，是当时全国政治、文化和教育的中心，现在也依然是关中、陕西以至中国北方一个大区域内的文化教育中心，高等院校林立，科研院所甚多，名列全国前茅，怎么会只具有地区的文化、教育的意义呢？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上的西安教育时，不能无视当时全国主流文化教育的存在和影响，同时又要挖掘、研讨本地区的文化和教育。

历史上的西安地域划分是不断变化、动态发展的。一般是指今西安市所辖区、县，以及历史上的“京兆郡”“关内道”或“西安府”，主要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畿辅地区，包括京兆、左冯翊、右扶风，分别相当于当今关中中部的西安、东部的东府和西部的西府。本书将探讨这一区域内的教育历史与特点。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难题，究竟应该怎样谱写西安教育的历史，尤其是周、秦、汉、唐时期的西安教育历史呢？为此，依近年出版的《陕西通史》^①例，我们给自己确定了这样两条选择教育事件和教育人物的标准：其一，周、秦、汉、唐时期，凡发生在今西安地区境内的教育事件，即为西安教育历史的内容。否则，即使再重要，也不归入西安的教育。其二，周、秦、汉、唐时期的重要教育人物，凡籍贯属于今西安地区范围者，则写入西安教育历史，凡籍贯虽不属于今西安地区，但其主要教育活动、事略却在西安地区，亦写入西安教育史。

第二节 研究西安教育的原则与意义

一、研究西安教育的原则

西安传统教育的绝大部分内容属于西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教育，是这些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活动，是由当时西安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是与当时统治阶级的命运休戚相关，是维护他们的利益和要求的，因而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的特征。为了正确认识 5000 年来的西安教育以及它所起的社会作用，必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必要的阶级

^① 郭琦、史念海、张岂之主编，黄留珠、周天游著《陕西通史·秦汉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 页。

分析，科学地、实事求是地给予分析与评判，以收“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之效。

但是，对于古代、近代西安教育的社会存在，以及当时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和要求怎样影响西安教育，则要考虑多方面的复杂情况，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具体的分析，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因为，教育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社会发展源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和意识形态，本身具有其相对独立性。其形成与发展，除了社会阶级根源外，还有认识根源。社会存在、阶级地位之影响教育并不总是直接的，而往往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不注意这些情况，把阶级分析简单化，用贴标签来代替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则是错误的。

为了对西安教育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们将特别注意以下两条重要原则：

一是把西安历朝历代的教育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予以评价，避免现代化和虚无主义。研究、分析一定教育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把特定的教育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评价。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原理，要求我们在评论历朝历代的西安教育时，必须考虑这种教育发生在什么历史年代，它所发生的那个年代的各种历史条件的特点如何，比如，它所产生的那个年代的社会发展状况，文化、教育的特点等等。因为这种教育的形成与发展，它的教育制度与教育理论的形成，都与这些历史条件的特点分不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按照历史本来的面貌来了解和评价各个时代的西安教育，不应把它加以现代化，或用现代的标准去苛求它。

其二，要客观地、具体地分析西安历朝历代教育家（包括政治家、思想家等）的教育理论。在这方面，我们要遵循革命

导师列宁所提出的标准：“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東西。”^①依照列宁这段话的精神，我们在衡量西安地区历代教育家是否有贡献，是否有成绩时，应该是把教育家和他的前辈比：他是否提供了他的前辈们没有提供的新的观点、理论，而不是把他和今人比，说他没有提供现代条件下所要求的東西。

总之，我们在阐述、分析、评价西安历代教育实践、教育制度和教育理论时，必须实事求是地反映这些实践、制度、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变化情况，客观地、具体地对待这些教育上的人和事，有功表功，有过斥过，不因其过而抹杀其功，也不因其功而掩饰其过。这样，才能不犯简单化的错误。

二、研究西安教育的意义

根据文化的定义，教育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广泛存在的社会实践活动和意识形态。所以，广义的西安教育可以说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狭义的西安教育即学校教育也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在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中，西安先民们在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世代积累和形成的知识经验，以社会历史经验的形式，通过教育传递给后代，并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逐步积淀下来，成为当时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手段，进而构成西安文化的主体。因此，西安教育和其他文明发源地的教育一样，它一经产生，便具有传递生产知识经验和一定社会的生活规范的职能，即具有传承文明、传播文化的职能，进而对社会的延续和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也决定

^①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0页。

了西安教育在西安整个文化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十分特殊的地位。

西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和文化发源地之一，是享誉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经济社会根基、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久远的文明传承。在如此灿烂的传统中，西安教育以其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而令人赞叹。它一方面受到西安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又筛选、传递和保存着西安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形成一种既相互适应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因而在这特殊的重要文化宝库中，亦不乏优秀的遗产和精华，其主要有：历朝历代高度重视教育，视教育为立国之本、执政之基；重视道德教育，追求人的全面和谐的发展；重视系统知识，特别是伦理道德知识的学习与实践；尊师重道，注意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官、私学校并举，多种形式办学；提倡多元并存、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雍容豁达，广泛容纳、吸收、融汇中华各民族、世界各国文化的开放精神等。这些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的确，作为西安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安教育，它总是精华与糟粕并存，长处与短处互见。西安教育既充满着智慧，同时也承载着因袭的重负。我们所要继承的是其中能够推动民族文化不断发展前进的优秀传统，而对那些陈旧腐朽之弊则应有清醒的认识，并进行理性的批评和认真的改造，使之成为当今和未来的西安教育所利用。

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曾言：“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位陕西先贤的论断已在历史的政治、军事层面上被多次证实；时至今日，这一论断又在和将在中国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全面走向小康社会的历史征程上再显其预见性。西北，西安，这个曾经孕育了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她的再次崛起和繁荣昌盛

盛，将是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关键性一环，而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劳动力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极大提高，将是这一环节中的核心内涵。

很明显，一个经过认真反思，改革开放起来的有数千年文化底蕴的西安教育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一个不再沉寂的中国西部教育定会让整个世界心旌摇荡。

让我们为这一天的到来鼓与呼！

让我们为西安教育的未来增砖加瓦！

让我们为西部壮丽的明天锦上添花！

第一章

原始时期的教育

“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尚书·舜典》

“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驯，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

——《史记·五帝本纪》

第一节 最早的人类教育

众所周知，西安是中国远古文明的摇篮之一。早在一百多万年以前的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这块美丽富饶的黄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并且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之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曾断言：“自有人生，便有教育。”^①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安远古时期就存在着原始的教育活动，保存并延续着人类的最初文

^① 杨贤江：《新教育大纲》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年12月版，第7页。

明。20 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及其周围地区所发现的原始社会遗址及其实物 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蓝田人的原始教育活动

西安的原始社会，大体可分为“原始人群”“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三个发展阶段。从已经发掘出来的丰富的出土文物或遗址的科学测定，距今



“蓝田人”头骨复原图

大约五六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距西安仅 30 公里的蓝田县城西北的泄湖镇陈家窝村和城东的九间房乡 公王岭地区，就生活着“原始人群”时期古老的直立行走的人——“蓝田人”。考古资料证明，蓝田人已经学会了制作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大尖状器、手斧、石球等劳动工具。原始先民已经几十人一

伙，结成原始人群，利用这些工具砍伐树木，挖掘植物根块，捕猎野兽。遗址中还发现了木炭和炭末，说明蓝田猿人已经懂得使用天然火，掌握了生火的技术。很明显，这些制作劳动工具的经验，取火的技术和用火的方法，不仅需要推广，更需要通过教育活动传授给年青一代。

二、半坡人的教育活动

考古还发现 距今约六七千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中 有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的石刀、石锄等 735 件农业工具和鱼叉、鱼钩等 644 件渔猎工具，并发现了腐朽的谷壳、白菜籽、芥菜籽等珍贵实物资料。这证明农业和捕鱼是半坡先民的主要生活来源。遗物中还发现了骨针、石纺锤和陶纺锤，某些陶器的底部有清晰的草席纹和麻布纹，这表明半坡先民已经会

编制草席，并用苧麻织布做衣服。这样一来，学习并掌握种植、捕鱼、纺织、缝衣服、制陶器等的生产知识和技能、技巧，无疑就成为重要的教育内容。

第二节 教育场所与原始文字的雏形

一、最早的中国教育场所

西安半坡先民的村落由居住区、制陶区和墓葬区等三部分构成，布局规划得很整齐，很有条理。居民区约 3 万平方米，中间是一所约 150 平方米的大房子，其周围分布着 46 座小房子，房子有圆形的、方形的，有地上的、半地下的，一般在 20 平方米左右，考古工作者判断，这应该是氏族成员居住的小房子。小房子房门一致向着大房子，凡氏族酋长的选举、氏族会议、节日庆典以及宗教活动等等都在大房子中进行。我国教育史学家毛礼锐先生曾判断：“这种中心大房子的一切活动起着重要的教育作用。大型房子也是老人和未成年人的住所，这说明大型房子也是老人对儿童和少年的教育场所。”^① 这一判断是符合实际的。证明西安半坡遗址的中心大房子是我国原始社会教育场所的实物证据。

半坡遗址这种“大房子”，后世称其为明堂。在氏族公共活动中，教育后代必然是重要的内容，因而古人又谓明堂为“大教之宫”，它是氏族内部施行社会教化的重要场所。这种推定，已获考古学界一些专家的认同。汪宁生先生在《释明堂》一文中写道：“明堂原是公众集会之处和各种集体活动的中心，

^① 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编：《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 页。



半坡遗址“大房子”复原图

具有祭祀、议事、处理公共事务、教育青年、训练、守卫、养老、招待宾客及明确各种人社会身份的功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者利用明堂作为祭祀和布政施教之处，但原来明堂的各种功能仍有痕迹可寻。^①此文中的“教育青年”，其原意可理解为“教育年青一代”。

从半坡“大房子”和后世此类“明堂”所处的位置和教育功能分析，在其中活动时间最长者，莫过于老人和儿童。因为青壮年男女更多的时间须外出劳作。可以设想，最初的“大房子”或“明堂”绝无后来氏族祠堂的森严，部落成员均可自由出入，且活动不受限制。儿童在此游戏或听老人讲述动人的传说，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至于祭祀、训练、待客等活动，儿童也是必然的参与者。这类活动富含教育意义也是毋庸置疑的事。所以，认定公元前 5000 年左右的西安半坡遗址的“大房子”是我国境内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教育场所，应该说是根据的和有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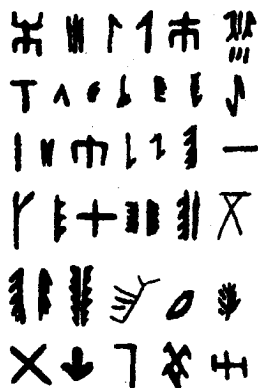
① 汪宁生：《释明堂》载《文物》1989年第9期。

二、“中国原始文字的子遗”

在原始时期，西安的先民还创造了各种原始的记事方法。在长期使用多种记事方法的基础上，逐渐发明了原始的文字。半坡遗址出土的完整陶器约 1000 件，按质地可分为细泥陶、粗砂陶和细砂陶；按用途可分为饮食器、炊器、盛器等。在这些陶器上有 100 多例刻划着 50 多种符号，少数刻在底部或腹部，大部分是在陶器未烧时刻的，只有少数几个是在陶器烧成后，或用过一个时期后刻划的。刻划简单，纹迹规整，其所在部位、形状和大小都有规律。



半坡遗址原始文字符号



姜寨遗址原始文字符号

郭沫若先生曾以极大的兴趣研究过半坡人的刻划符号，断定那便是最早的汉字。他说，这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子遗”。又说：“汉字究竟起源于何时呢？我认为，这可以西安半坡村遗址距今的年代为指标。”还说，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彩陶和黑陶上的刻划

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①。学者于省吾也认为半坡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文字。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汉字产生于殷代前期的王亥时代^②；有学者认为产生于夏代；有学者认为产生于虞夏之际^③。如果将来地下文物能更充分地说明半坡符号与夏代文字、殷代前期文字、殷墟甲骨文和殷周铜器上的铭文、族徽之间的联系和演变过程，则最早的汉字可以追溯到距今6000多年以前，而西安则是原始汉字的发源地。

值得注意的是，距西安不远的临潼县城北5里的姜寨遗址，与半坡遗址同属于新石器时代遗址，反映的都是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情况，同属于仰韶文化，但姜寨先民要比半坡先民晚约1000年，因而又含着丰富的龙山文化的内容。在姜寨遗址出土的1万余件文物中，在许多陶器上发现有种类繁多、笔画规整复杂的刻划符号，显然比半坡原始符号进了一步，似乎已具有文字的性质。这说明，不论是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上的刻划符号，还是临潼姜寨出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都是西安地区原始先民共同使用的符号，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些符号都代表什么意义，但可以设想，在有文字以前，它是人们表示思想意识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具有原始文字的功能，并在传授中存在着有关的教育活动，初步具有了专门化的特性，是后世文字教学的先导。这当为我国文字的渊藪之一，是我国文字诞生的前奏。

①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246、224、24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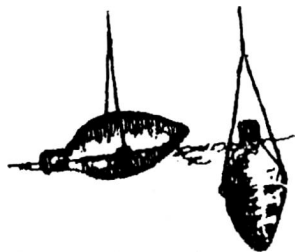
② 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90 页。

③ 转引自孟宪承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 页。

第三节 生产、生活经验的理性化 和艺术教育

一、生产、生活经验的理性化

文物资料证明，西安原始先民的生产、生活经验已经开始走向系统性、综合性和理性化。例如半坡人用以汲水的小口、鼓腹、尖底的瓶子，接触水面时瓶口会自然地倒向水中，水灌满后瓶身成垂直，提出水面时瓶身垂直不倒。这种陶器的制作符合物理学上的重心原理，是原始先民生产、生活经验理性化的体现。同时，半坡人使用的渔猎工具的外形和彩陶器的装饰图案都有非常规则的几何图形。在出土的文物中更有 1 个、2 个……



半坡的尖底瓶

8 个圆点排成三角阵的“数字陶片”。在半坡陶器上也有不少对称的彩绘图案，在图案中轴两侧的

笔画数完全相等，其一侧有 2 个斜线或折线，或为 3、4、5、6、7 个斜线或折线。这些有序的圆点或线段，表明半坡人已能认识和掌握 1 至 8 的自然数，也清楚地显示出原始自然数概念和记数方法。很明显，这些经验经过加工而成为理性的知识，经由教育而代代相传，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

二、艺术教育的发展

在传递原始生产、生活经验的基础上 艺术教育也得以发

展。半坡遗址中有多种多样的装饰品，用料有石、陶、骨、牙、蚌、玉等，造型有环、珠、耳坠、簪子、璜等。在一个女孩遗骨的腰部，人们还发现了一件漂亮精致的艺术品——由60多粒骨珠串成的珠带。出土的陶器上还有大量的彩绘和塑造艺术。彩绘有花卉、动物、人面和几何图案，其中以人面鱼纹图案居多。有专家认为，半坡先民以鱼为图腾，想像丰富，形象生动，明暗对比强烈，对称中又有变化，艺术地再现了原始先民渴望渔业丰收的心情。另外在姜寨遗址的墙壁上，人们还发现了多圆窝和直线组成的三角形、平行四边形图案，起着装饰墙壁的艺术作用，可算是原始壁画的初次发现。这些珍贵的装饰品和艺术品，反映了西安先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也说明了艺术活动和艺术教育已孕育于原始先民的社会实践之中，教育是在向更高的水平发展着的。



半坡的人面鱼纹图

第四节 对西安原始教育有贡献的人物

一、仓颉造字的功绩

在远古文化教育的发展中有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就是文字的最终产生和使用。

原始社会末期，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及其氏族部落即劳作、生活于陕西境内，奠定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基础。据记载，黄帝时已发明了车船，制造了炊具，蒸小米饭，煮稀饭，吃熟食；他劝导农业，最早开始从矿石中提炼出铜，并发明了图画、音乐等^①。他的妻子嫫祖还发明养蚕，制作衣服，促使原始先民从原始蒙昧状态向文明时代大步迈进。而文字的发明和使用则直接促进了这一文明的进程。

中华汉字的具体发明者是谁？据说是仓颉。他是黄帝的史臣。传说仓颉长着四只灵敏而充满光泽的眼睛。据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序》说，仓颉“见鸟兽蹄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 初造书契”。又说：“仓颉之初作书 盖依类像形 故谓之‘文’ 其后声形相益 即谓之‘字’。”字成之日 举国欢腾 据史书载：“天雨粟 鬼夜哭”这可能是风将别处的谷子吹来，人们认为是上天赐福。这也形象地说明有了文字，曾促使社会进步，生产力提高，收获剧增。鬼是危害人们生存的敌人、猛兽和自然灾害等的形象体现。发明文字以后，人能战胜各种危害，鬼对人已无能为力，只好夜间哭泣。有了文字，促

^① 参阅《世本》。载张岂之主编：《五千年血脉——黄帝及黄帝陵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6 页。